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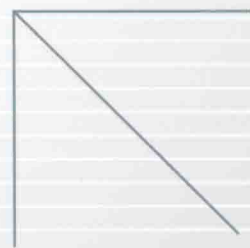



Finance

农村金融学

NONGCUN JINRONGXUE

主 编 唐青生



 中国金融出版社

014059863

F830.3-43
03




农村金融学

NONGCUN JINRONGXUE

主 编 唐青生



 中国金融出版社



北航

C1746790

F830.3-43
03

838820110

责任编辑：贾 真

责任校对：李俊英

责任印制：陈晓川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农村金融学 (Nongcun Jinrongxue) /唐青生主编.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4. 9

新编高等院校金融类系列教材

ISBN 978 - 7 - 5049 - 7629 - 1

I. ①农… II. ①唐… III. ①农村金融—研究—中国 IV. ①F832. 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3929 号

出版 **中国金融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 2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66347, 63805472, 63439533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尺寸 185 毫米 × 260 毫米

印张 18

字数 400 千

版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ISBN 978 - 7 - 5049 - 7629 - 1/F. 7189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3263947

序 一

唐青生教授请我为他主编的教材作序，欣然应允乃为鼓励他多出佳作。唐教授当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即以《西部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研究》为题，获郾校优秀博士论文奖。而后他又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得以继续深化相关问题的研究。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唐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拟将他们长期研究的积淀转化为《农村金融学》教材正式出版，实现科研为教学服务之目标，实在可喜可贺。

综观全书，个人觉得有以下亮点：第一，对涉及农村金融的相关基本理论、主要金融机构、主要金融业务、主要风险及其监管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方便应用该教材的师生系统掌握相关理论和知识；第二，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并引导读者深入探讨农村金融改革的新问题；第三，分析了主要代表性国家的农村金融体系及其运作经验，有益于读者从中获得推进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启示；第四，理论分析与具体实务的篇章结构安排合理，既有对农业信贷补贴论、农村金融市场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论等农村金融理论的阐述，又有对农村金融市场的供求分析，还有对农村银行、保险、租赁、担保、小额信贷等业务的精要介绍。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2014年1号文）进一步强调“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上述重要文件表明，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不仅任重道远，而且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抓手”之一。唐青生教授主编的《农村金融学》出版可谓正逢其时。

尽管该书的某些体例不尽完美，某些理论和问题探讨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总体观之瑕不掩瑜。该书为农村金融教学提供了一本与时俱进的新教材，也是相关从业者不可多得的参考读物。是为序。

刘惠好

全国政协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八日

序 二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大幕正式拉开。我国改革开放最早始于农村，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引发了我国农村的第一次巨变。1984年随着改革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城乡关系问题、区域发展问题和“三农”问题日益凸显。2000年后，随着“三农”问题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及“西部大开发”、“城乡统筹”和“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逐渐成为全国上下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和重大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很显然，“三农”问题已经成为阻碍我国整体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瓶颈”，它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的成败甚至执政党的安危。同时，我国既是一个经济正在转型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更是一个农业大国，13亿多人口还有将近一半在农村，因此，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顺大势、得人心。

2004年以来，党中央连续下发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把“三农”问题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显示出我国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和信心。由此可以看到，我国农村的第二次巨变正在或已经到来。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今经济与金融的关系。那么，如何破解“三农”问题，以什么作为突破口呢？我们认为，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唯有农村金融才能从根本上破解“三农”难题从而成为重要的突破口。这是因为：第一，资金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农村经济也不例外；第二，资金和资本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引擎”，具有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的作用，农村经营主体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活动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第三，作为虚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得好能够发挥出引领并活跃实体经济的作用。因此，研究农村金融，从理论和实际出发，了解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分析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学习借鉴国外农村金融发展的经验，并由此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因此，我们多年来一直想编写一本农村金融学教材，通过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现

在终于付梓印刷了。本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内容覆盖较为全面。对涉及的农村金融理论、农村金融机构及其产品业务、农村金融风险与监管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系统的介绍，以使初学者对农村金融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性的了解。

第二，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农村金融理论的一般介绍与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实践紧密结合，让学习者了解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种种问题，从而拉近他们与现实的距离。通过实际问题的反复引导，培养学生理论分析、独立思考、接触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三，历史与现实问题相结合。通过对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发展历史的介绍，使学习者能够较好地了解其发展脉络、发展过程和相互关系。通过对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剖析、农村金融改革艰难历程的回顾和农村金融改革目标及其发展思路的分析，使学生认识到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任重道远和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第四，前沿性和启发性。本书尽可能引用、借鉴当今国内外农村金融研究的一系列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对我国农村金融现状、问题和对策措施的阐述，对国外农村金融理论和实践的介绍，无论对初学者还是入行者都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本书适合作为财经类金融专业学生、金融机构员工学习、培训的教材，也适合作为对农村金融知识有兴趣人士的参考书。

本书由唐青生负责总体框架设计并修改总纂。本书共由九章组成，主要编写人员为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师，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章、第二章唐青生；第三章第一、第五、第六、第七节何锦，第二、第三、第四节杨慧；第四章张建友；第五章第一、第二、第三节樊永勤，第四、第五节梁隆斌；第六章陈爱华；第七章陈永忠；第八章吴永兴；第九章孙文军。以上人员绝大多数是教授、副教授和博士，富有多年的教学经验和较多的农村金融研究成果。

但是，由于时间较紧，资料有限，以及水平所限，本书作为我们共同努力而形成的一个阶段性教学研究成果，无论体例还是内容方面必然存在诸多缺陷，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唐青生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目 录

1	第一章 农村金融学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农村金融的意义	
4	第二节 农村金融研究的逻辑起点	
14	第三节 农村金融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标	
16	第四节 农村金融学的研究方法	
19	第五节 农村金融学的框架内容	
21	第二章 农村金融学基本理论	
21	第一节 农村金融概述	
29	第二节 现代金融发展理论	
35	第三节 农村金融理论	
45	第三章 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45	第一节 新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演变与发展	
51	第二节 中国农业银行	
59	第三节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68	第四节 农村信用社	
78	第五节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81	第六节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94	第七节 农村非正规金融体系	
103	第四章 农村金融业务	
103	第一节 农村银行业务	
121	第二节 农村保险业务	
126	第三节 农村典当租赁业务	
129	第四节 农村担保业务	

131	第五节 其他农村金融业务
135	第五章 农村小额信贷
135	第一节 农村小额信贷的定义与特点
138	第二节 农村小额信贷的产生与发展
144	第三节 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148	第四节 农村小额信贷的运作
161	第五节 农村小额信贷的模式及其选择
170	第六章 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
170	第一节 农村金融供给
178	第二节 农村金融需求
188	第三节 农村金融供求失衡及其原因
194	第七章 农村金融风险与监管
194	第一节 金融风险管理与管理理论框架
200	第二节 农村金融风险概述
203	第三节 农村金融风险管理的意义
212	第四节 农村金融风险监管
216	第八章 国外农村金融
216	第一节 美国的农村金融
225	第二节 日本的农村金融
232	第三节 印度的农村金融
236	第四节 孟加拉国的农村金融
239	第五节 国外农村金融发展的启示
242	第九章 我国农村金融的改革与发展
242	第一节 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基本历程
256	第二节 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总体目标
259	第三节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64	第四节 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政策举措
275	参考文献

第一章

农村金融学导论

农村金融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来自实践并对实践产生指导作用。本章主要对农村金融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进行简要介绍，使学生或初学者对这门学科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背景有一个基本的把握。特别强调在当今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以及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下，研究农村金融的重要意义及其研究的逻辑起点必须立足我国“三农”发展现实，最终实现“三农”问题的逐步解决和城乡一体化目标。

第一节 研究农村金融的意义

一、资源配置与要素流动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是推动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或资金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核心要素和主要推动力，因而作为最稀缺资源自然而然地成为资源中的资源。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资源配置，如何将最稀缺、最有限的资本或资金最广泛、最有效地动员和配置到国民经济的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部门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难题。

在传统不发达经济中，商品经济决定着货币经济，商品流通的规模、结构和速度决定着货币流通的规模、结构和速度，商品流引导和决定着货币流，商品是第一位的、主导的，而货币是第二位的、附属的。而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则刚好相反，货币经济决定着商品经济，货币流通的规模、结构和速度决定着商品流通的规模、结构和速度，货币流引导和决定着商品流，货币是第一位的、主导的，而商品是第二位的、附属的。正因为如此，有人将我国目前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称为货币经济、信用经济或金融经济。可见，货币、资金、资本、金融等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最重要形式与内容，其流动规模、结构、方向与速度已经影响到我国经济的运行发展。

像商品需要交换、交换产生价值一样，资金也需要流动，而流动产生价值。金融机构将居民个人、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资金以存款的形式吸收进来，又以贷款的形式发放出

去,这种货币资金的运动过程,也就是其价值增值的过程,即金融机构通过给存款人支付利息使存款人获得收益,而从借款人收取贷款利息使之付出资金使用成本,这样无论对存款人还是金融机构和借款人都带来了一定的价值,这种货币资金的运动形式已成为银行金融机构最基本的运作方式。

二、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

我国农村地域广大,人口众多,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镇人口快速增长,农业人口明显下降,但仍然高达50%左右。^①根据金融服务对象和地域空间的不同,一般地我们可以将金融划分为城市金融和农村金融。简而言之,在城市设立主要为城市居民、工商业者和企业服务的金融称为城市金融,而在农村设立主要为农民和农村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称为农村金融。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分治、城乡分割、重城轻乡,直接导致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村金融由于身处农村,面向“三农”,机构多而散,业务产品单一,硬件设施落后,人员素质较低,经营管理不善,服务质量较差,因而与城市金融相比有天壤之别。城市金融则由于地域优势、人才优势、资金优势、政策优势等,使得我国的金融资源绝大部分集聚于大中城市,享受着超垄断收益和各种金融特权。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经济改革重心向农村的转移,农村迸发出了巨大的生机与活力,“万元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城乡“剪刀差”开始缩小,农村金融也开始活跃,以信贷方式有力地支持了农民种植业、养殖业、个体工商业和农村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农村改革好景不长,自1984年改革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后,使得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又开始进一步拉大,农村金融不被重视,以至于以农村为代表的广大落后地区愈来愈成为影响我国整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障碍与阻力,由此也加剧了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差异和城乡二元经济的进一步扭曲。

三、“三农”问题与农村金融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三农”问题^②的提出,显示“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的根本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主要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实质上是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农村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面貌落后,经济不发达,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农业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种田不赚钱,农业生产方式落后,产业化和商品化程度低。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三

^①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有关数据显示,2011年底,我国人口总量为13.47亿人,其中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农业人口为6565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城镇人口比农业人口多3423万人。

^② “三农”即农村、农民和农业,“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最早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1996年正式提出,自此渐渐被媒体和官方广泛引用。2000年2月,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写信,反映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信中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此后,“三农”问题得到了政府的高度关注和重视。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开始写入文件,正式成为我国理论界和官方决策层使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农”问题高度重视，2004—2014年中共中央连续十一个“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的，各级政府也都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核心与重点，并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支持“三农”政策。农村金融自然成为“三农”问题化解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三农”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资金投入问题，而农村货币资金的组织、流通与管理靠的就是农村金融，因此，农村金融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我们知道，传统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中，人们对商品与货币并不看重，他们需要的只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简单再生产，抱着老死不相往来、不愿意借贷、不屑于谈钱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我国计划经济中，其典型特点是高度的计划性和垄断性，从而使得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范围和作用被大大限制，各个经济主体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目前我国已处于商品经济时代，市场成为它的“代名词”，而市场既需要交易主体和交易对象，也需要交易工具和交易媒体，而交易工具便是货币，交易媒体就是金融机构等中介服务机构。很难想象，在当今我国和已经全球化的经济社会活动中，没有货币和金融机构这个世界会是怎样。由此可以推断，货币与金融正在史无前例地发挥着无以复加的威力，影响和改变着国家和人们的命运。

既然货币与金融如此重要，那么谁重视它、谁掌握它并运用好它，谁就得利受益。在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尤其在“文革”中，金融抑制严重，不受重视。改革开放之后，金融的地位和作用才开始显现积极可喜的变化，金融的规模与质量也得到极大提升。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直到现在，城市金融还是占据着种种金融优势与特权，享受着种种金融便利与奢华，而农村金融相对逊色得多，不仅拥有的金融资源少，金融供给严重不足，而且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一些偏远贫困的农村地区甚至存在金融服务网点空白与金融服务严重缺失现象。^①因此，在“三农”问题上升为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并摆在十分重要的突出地位，以及我国“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西部大开发”等重大背景下，如何解决好“三农”问题，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城乡统筹，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等，都要求农村金融发挥更大的作用。

近些年来，虽然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创新不断，但农村金融供不应求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改观，农村金融供求矛盾依然十分突出。回顾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历程，不难发现，从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是在没有触动金融体制下自发进行的。农村经济改革取得初步成功后，从1984年开始，改革的重心便很快在政府的主导下转向城市和工业。市场化过程中，城市和工业改革迫使政府通过金融向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注入资金。20世纪90年代以后，连续不断的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政府对金融的依赖变得谨慎起来，金融监管和控制也更加严厉。为化解国有金融风险，政府发起了以强化自我约束为特征的国有金融改革，国有金融开始收缩网点地域，大量从农村撤出，一些地方甚至出现金融服务空白现象，农村金融问题日益显露并不断恶化。由于缺少农村金融支撑，农村经

^① 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11年底，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网点空白的乡镇仍有1696个。

济发育不足, 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 进而又制约了农村金融发展, 农村金融改革最终没有内生出适应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需求的农村金融。

为化解日益恶化的农村金融问题, 缓解农村金融供求矛盾, 我国开始实施农村金融“新政”。^① 2007年2月8日, 我国首家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获准开业。2007年12月13日, 我国首家由外资银行全资设立的村镇银行——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正式开业。作为农村地区新型金融机构的其中一项重要成果, 村镇银行经历了2007年、2008年和2009年3年的缓慢发展, 自2010年村镇银行开始了相对明显的扩张。据银监会统计, 截至2013年10月, 我国村镇银行数量已达到1000家, 实现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村镇银行全覆盖, 其中中西部地区组建620家, 成为服务“三农”、支持“小微”的重要生力军。目前村镇银行正以燎原之势快速发展。尽管如此, 相对蓬勃旺盛的“三农”金融需求, 农村金融供求矛盾依然十分突出。一方面, 农村金融需求在不断增加。据国家统计局测算, 到2020年我国新农村建设新增资金需求总量大概在15万亿元。另一方面, 农村金融供给依然严重不足。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 2011年底, 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涉农贷款余额12.15万亿元, 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24.5%, 而农村GDP占全国的46%以上, 农业贷款2.44万亿元, 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重不足6%, 而农业在GDP中所占比重10.2%。^② 一些研究显示: 农户5万元以上的大额贷款需求增加, 农户贷款满足率不到1/3, 农村中小企业信贷需求正规金融仅能满足20%~30%, 其余必须依靠非正规金融。虽然近年来在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 城乡资金开始双向流动, 但农村资金流出规模仍在扩大, 尤其是欠发达农村地区。而且, 农村金融日益明显的“脱媒”、储蓄下滑和分流现象, 也给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造成了巨大的困境。正因为如此, 从2004年至2014年, 中共中央连续下发“一号文件”聚焦“三农”, 高度重视农村金融, 不断强调深化农村金融改革, 并推出了一系列农村金融改革新举措。可见, 农村金融对于“三农”问题化解具有至关重要的引领和核心作用。

第二节 农村金融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如上所述, “三农”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总体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并将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依然是我国必须面对的根本性、关键性难题。因此, 我们在考察和研究农村经济、农村金融问题甚至我国许多重大问题的时候, 需要对我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不了解传统农业社会、转型经济背景下“三农”的历史和实际状况, 就难以找到问题的根源和症结所在, 也就难以对症下药。因此, 研究农村

^① 2006年12月21日, 银监会颁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 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鼓励符合条件的境内外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投资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② 2012年底, 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涉农贷款余额达17.83万亿元, 与2011年相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金融学的逻辑起点必须立足“三农”，以“三农”为出发点，全面地、系统地把握和理解“三农”，具体包括：第一，深刻地把握农民的行为特征，尤其是农民信贷行为的基本特征，从而为研究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村金融市场的效率奠定基础；第二，系统地探究农村社会组织的基本特点，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农村地区特有的社会网络特征、人际关系格局、信用发展路径，以便我们理解农村特有的信贷形式和农村金融管理模式；第三，全面地理解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产业特征，以及这些产业特征对农村金融提出的要求，从而为探讨农村金融的未来发展提供理论基础。^①而所有这些工作，首要的是研究农民，了解农民，理解农民。

一、理解农民的重要性

我们这里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和特指的我国的农民。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农民为城市和工业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同时还为工业化贡献了大量的金融剩余。但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的地位却被严重地忽视，农民成为社会中被“边缘化”的阶层，农民的社会地位、福利待遇和公民权利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保障，农民成为事实上的“超弱势群体”。忽视农民的状况处处可见：城市管理者设置各种壁垒，对农民进入城市所从事的职业、报酬和社会福利进行限制；国家政策的制定常常忽视农民阶层的利益，在城乡交易、社会保障和税收中推行损害农民利益的政策措施，农民作为一个群体似乎已被主流社会及其话语系统所遗忘和忽略。

在我国，传统的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和小农经济，使农民长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的政治地位有所上升，而经济地位依然很低。十年（1966—1976）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农村景象破败，农业经济凋敝，农民食不果腹。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改革开放”政策，由此，农民开始获得新生，农村渐显繁荣景象。但是，我们要历史地、辩证而清醒地看到，自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并直至目前，农民为我国经济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他们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节衣缩食，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而且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为工业和城市提供了大量低廉的农副产品。但是，直到目前，他们依然收入较低、依旧贫困，农民的公民权利也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著名经济学家和中国农业改革的先驱者杜润生曾写过一篇《我们欠农民太多》^②的文章，揭示了农民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被严重忽视的事实，呼吁关注农民的权利和生存状况。在其另一篇文章《给农民国民待遇》^③中，杜润生指出：农民与城市居民相比，还没有获得国民待遇，农民作为一个公民还受到很多歧视。例如，自由迁徙权利的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不公平；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农民税负和其他隐性负担沉重；农村医疗卫生体系未建立；

① 王曙光，乔郁. 农村金融学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7-91.

② 参见杜润生为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所写的序言，收于杜润生所著的《中国农村制度变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0-311页。

③ 杜润生.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300-302.

农民在城市就业的基本权利没有保障；土地制度不稳定；农村贫困现象严重，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农村贷款困难，农民因缺乏抵押品而不能获得金融机构贷款；村民自治尚未制度化，农民的政治权利没有保障；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没有自己的政治性组织保护自己的权利；等等。这些状况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束缚了农民作为公民的全面自由发展。

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基本实现了工业化，或者进入工业化后期，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使命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农民的问题必然要求得到应有的重视。为此，我国政府近年来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构想与改革举措，包括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农村城镇化、扶贫攻坚战等，这无疑对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和经济结构的全面优化起到重要促进作用，也对农民的权利和地位有了新的积极评价。这表明，长期以来我国依靠农业部门贡献大量农业剩余（包括农村金融剩余）来为改革发展和经济转轨支付大规模制度变迁成本的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同时三十余年经济转轨的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年均8%以上的持续高速增长也使得我国积聚起了足够的国民财富，从而有能力对当前发展相对滞后的农业部门、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农村和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进行某种程度的“反哺”。这种“反哺”是制度变迁中必要的补偿机制，既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区域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及社会和谐稳定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认识农民、了解农民的生存状况并进一步理解农民，应是我们所有学生和经济学者的基本职责，甚至应成为我们每一个公民的必修课。

二、农民、农户及其一般行为特征

农民是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当我们试图理解农民的时候，我们必须深入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去，把农民当做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去审视。反过来，当我们理解文化传统的时候，我们也必须首先理解农民，难以想象可以在忽视农民的基础上透彻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农民，从概念上来说，是指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以及其他相关活动的劳动者。在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中，农民一直是传统社会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也是统治者大力倡导的产业。我国传统社会中一般将国民分为“士、农、工、商”四民。所谓士民，即“学习道义者”；所谓农民，即“播殖耕稼者”；所谓工民，即“巧心劳手以成器物者”；所谓商民，即“通四方之货者”。^① 传统社会中对农民的重视显然是出于统治者自身的需要，农业生产的稳定是国家财政稳定的重要基础，因此我国历史上几乎所有主流的经济思想都主张“重本抑末”，所谓“本”，就是农业生产，所谓“末”，就是工商业。而在我国已经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今天，虽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不可动摇，但是工业社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流动性加快、货币与财产性收入等都是当前新型农民在转型经济社会中必然面临的问题，由此使其产生和

^①（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食货志[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形成不同的心理,如一些城郊农民由于城市扩张而失去了土地,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或经商而带来的子女入学教育问题、赡养老人问题、夫妻长期分居问题,“离土又离乡”的“农二代”、“农三代”,以血缘、亲缘关系维系的宗族及社会交往关系等,这些社会转型中带来的变化与问题必然影响着他们的心理从而影响其借贷行为。

理解农民的基础是,还必须将农民视为“理性经济人”,而理性经济人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对自身成本收益的精明而准确的计算。提出这一基本假说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在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中,农民被假定为非理性的,甚至是“愚”。乡村建设的先驱者晏阳初将中国农民的弊病总结为“贫、愚、弱、私”,因此倾其毕生心力关注农民问题,倡导农村的文化建设。确实,从文化知识来讲,农民无疑是最缺乏的,晏阳初的判断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将这种文化知识的缺乏理解为农民的非理性,则大错特错。“理性经济人”在这里并非一般的经济学假定,而是正确认识农民的必要前提。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对生产、投资和消费都有着一种特殊的、谨慎的成本—收益计算方法,这使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最好的经济学家。当我们发现农民的一些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的行为时,我们切记首先不要以“非理性”来加以轻易地解释。农民是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特征,根据自己的预期收益和成本来确定自己的行为的。比如,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民往往以较高的利率水平接受高利贷,如果仅仅从“非理性”这个视角来观察,我们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实际上,高利贷的存在是农村资金供求、交易成本和信息等各种因素造成的必然结果,是农民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将农民行为理解为理性选择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发现那些“不可理解”的农民行为背后的根源,从而以一种更为科学和客观的眼光看待发生于农村的各种经济现象;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通过这种观察,可以反省自己制定的“三农”政策的合理性,而不是简单地抱怨农民的“非理性”和“愚”,因为任何现象的背后都有着必然的原因。

在农民经济理性的假定基础上,我们来考察农民行为的基本特征。下面我们重点探讨传统农业社会和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农民(或传统农民)的行为特征。

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行为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以亲缘关系为纽带的人际交往网络。传统农民的人际交往是以亲缘关系为纽带来维系的,当他试图去做什么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亲戚能够帮助他什么,在决策上,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能够提供什么帮助,然后再拓展到朋友关系、熟人关系。所以就不难解释,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难以内生地演化出现代企业制度,而是天然地成长出一个又一个的家族式企业。农民的借贷行为就是在这种特殊的人际网络关系基础上展开的。

第二,以个体分散决策为基础的日常工作和生产方式。在小农经济下,农民在自己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上耕耘,土地面积与生产规模的狭小导致他们只能以分散的决策来规划他们的投资和生产行为。分散决策意味着农民天然带有一种小私有者的特性,带有个体主义的倾向,抗风险能力较弱,对任何新生的技术和组织形式采取观望的谨慎态度。

第三,缺乏社会性保障前提下的风险规避型行为方式。由于传统社会中社会保障体

系的普遍缺位，导致农民对风险的抗击能力减弱，而采取谨慎规避的心态。这种保护主义的特性，在农业社会中是一种自我保护、防范风险、避免大规模破产的必然要求。农民的风险规避型行为特征意味着农民的任何改变或者革新都只能是尝试性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社会改革或者大规模的创新行动在农村难以推行。农民是理性的，由于他用来抗击未来不确定性的资源很少，因而他很难轻易接受不熟悉的事物。只有当他切实地感受到革新带来的积极效果时，才会慢慢地真正接受。我国文化传统中的保守主义和中庸主义的国民性格，实际上就是这种小农性格的折射。在农民的借贷行为中，一是他们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愿意主动进行借贷，二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抵押物和高价值物品，他们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以很小的规模进行借贷，所从事的投资也一般是风险较小收益比较稳健的项目。

第四，以家庭为基本组织单位，排斥商业化的市场运作机制。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农民以家庭或农户为基本组织单位，其生产具有分散性，投资决策是个体主义的，分工不明显，其交易大多是一种小范围内的、小规模消费性的交易。家庭里的权威长辈往往是决策的制定者，家庭内部的分工较为明确而细致，一切生活消费物品基本上以这个家庭自己生产的东西为基础，从而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传统农业社会的这个特点，使得农民对市场是陌生的，对市场交易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是陌生的，对复杂烦琐的商业化市场交易是排斥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农民一般不愿意向金融机构借款而宁愿向高利贷者借款的原因。

第五，对家族声望与个人信誉的极端珍视。传统社会中的农民，由于从小生活在一个相对小而确定的社区中，他们对各自的家族历史和行为特点非常熟悉和了解。家族声誉高，人们的信任度也就很高。如果有人败坏了声誉和名誉，那么人们会要么指责他，要么回避他，而他自己在本社区就难以有脸做人，甚至有被剥夺生存权利的危险。因此，他们会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信誉，同时维护家族的信誉。这也是其借贷信用非常之高的重要原因。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研究农村金融市场中的借贷关系等问题时发现，一般单个的农民很少作为借贷的基本单位，而往往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因此在分析农民借贷关系和评估农民信用的时候，很少着眼于单个的农民而是农户（但有时候也二者等同）。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农户及其行为的研究文献，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流派，即“理性小农派”和“道义小农派”。^①“理性小农派”强调农户的理性动机，早期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T. W. Schultz）；“道义小农派”则强调农户的生存逻辑，早期代表人物是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恰亚诺夫（A. V. Chayanov），后来在此基础上黄宗智提出了著名的“拐杖逻辑”，费孝通提出了“补贴收入说”。黄宗智认为，一个贫农既然无法单从家庭农场或单从做佣工满足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他就只好同时牢牢地抓住这两条生计不放，缺一便无法维持家庭生活，因

① 张杰：《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变迁与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此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外出务工是农户维持生存的“两根拐杖”，有学者便称此为“拐杖逻辑”。费孝通认为，要解决农民的生活缺口问题必须通过家庭手工业和外部务工。在黄宗智和费孝通的研究中，“两根拐杖”一是农业，二是手工业、乡村工业，他们都将手工业、乡村工业作为解决生存、补贴家计的手段。但他们所研究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农民，他们没有分析当今中国大规模的农民打工现象及其生存动机。

为此，下面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代农民打工者的动机与生存逻辑进行剖析，^①为转型社会农民的心理变化及其借贷行为提供些许参考依据。邓大才将我国农民工划分为三代。第一代打工者是指改革开放后分田到户后的第一批外出打工人员，他们打工的动机主要是解决全家人的吃饭问题，他们主要是男劳力，他们没有放弃承包地，既务农，也务工。目前第一代打工者年纪已大，大多超过50岁，打工的基本目标已经实现，后代已长大成人、成家。第一代打工者大多被后代取代，此时需要第一代打工者回家种田、看家、带小孩，有的打算回家养老。第二代打工者是20世纪90年代的外出打工人员，是吃饭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农民对生产、生活、交往社会化和市场化诱致的货币支付问题的反应，说白了货币压力是他们打工的基本动机，货币收入最大化是他们的行为目标。而第三代打工者则是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出生的青年人，他们年轻，知识水平较高，一般都是初中毕业，还有不少人是高中毕业或者职中、职高毕业。第三代打工者既不为生存打工，也不为货币打工，而是为自己打工，为自己的前程而打工，为了离开农村而打工，为了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而打工。大部分打工者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回乡，也根本没有想到要务农，离农、脱农倾向明显，追求个人享受，同时他们也能够并敢于承担一定的风险。

三、农民、农户借贷行为与信用分析

以上对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农户行为的基本特征进行了重点分析，而对于当代农民即处于传统农民与现代农民之间的转型阶段的农民进行了一般分析，主要是因为几千年来我国农业社会和传统文化对农民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环境和客观条件在不断发生变化，如由于农民大量外出打工而出现的农村“空心化”，“农二代”、“农三代”道德价值观的变化，农村城镇化及失地农民问题，以及农业产业化、农村金融的深化等，但是总体上看，农民的小农经济特征仍旧比较明显，难以很快摆脱，尽管有的方面可以看到已经发生了积极的可喜的变化，如思维观念的开放性、竞争性和创新性等。因此，本书仍主要以传统农民为对象，并适当结合当代农民的一般行为及其表现，对其目前存在的借贷行为与信用状况进行分析，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借贷用途的非生产消费性比重较大，生产性投资比重较小。这一特征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体现得比较明显。从目前来看，其生活消费性借贷主要用于盖建新房、子女教育、看病住院、人情往来等。

^① 邓大才. 农民打工：动机与行为逻辑 [J]. 社会科学战线, 2008 (9).